

# “不变”与“万变”：陈崇桂的圣经诠释与中国社会<sup>〔1〕</sup>

赵盼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摘要：**陈崇桂(1884—1963)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教会领袖和基督教文字工作者，他曾写作了大量关于基督信仰与圣经诠释的文章。陈崇桂坚信圣经的权威与绝对无误，并且主张圣经的教训应该被应用于社会和国家之中。本文主要研究陈崇桂如何在不同时期，藉由圣经诠释表达其社会思想。在三十年代前期，陈崇桂写作了圣经的逐章灵修注释，他将圣经中的以色列政治和人物故事与中国社会相联系，以阐发其社会改造思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主张以时事代入圣经文本的方法，来控诉侵略，寻求安慰。而在五十年代，他以对《腓利门书》的细心研读来表达自己的教会与政治立场。陈崇桂将「不变」的圣经思想应用于「万变」的社会和政治处境中，以回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关键词：**陈崇桂；圣经诠释；中国社会；民国；基督教

**作者：**赵盼，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喻家湖路湖北省博士后公寓，邮编：430000，电话：15071263218，电子邮件：zhaopan813@gmail.com

“圣经是‘不变’的真理，它绝对无误，其中所讲述的教义字句都不可更改”。对于这一观点，活跃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会领袖、基督教文字工作者陈崇桂坚信不疑。但是，人类的历史、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则是复杂多变、风云诡谲的，对此，想必在满清、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中颠沛浮沉八十载的陈崇桂更加深有体会。陈崇桂坚持基要主义的圣经观，强调圣经权威，热爱读经解经。他不仅出版了《圣经总论》一书介绍圣经的主要内容，还写作了数千余篇释经文章。不同于很多基要派“不问世事”，陈崇桂对社会问题、国家命运甚是关心，这明显地反映在他的释经之中。陈崇桂生逢一个变迁的时代，这种“变”与基要主义者所坚持的圣经权威的“不变”之间，就不免产生巨大的张力。本文正是试图研究陈崇桂如何通过圣经诠释来表达其社会和国家思想，以及社会处境的变化如何影响他对于圣经的解释。

## 一、圣经的不变性

陈崇桂坚持圣经完全出自上帝启示、绝对无误，是基督教的绝对权威，这是始终没有改变的。他宣称：“我信圣经的内容，是神的道，全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我信圣经是宗教信仰的和人生行为完全的无上的准则和权威。我信圣经最初的原稿本，是绝对正确，没有错误的。”<sup>〔2〕</sup>陈相信，圣经

〔1〕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基督教基要派的中国化研究”(18YJC730008)的阶段性成果。

〔2〕 陈崇桂 CHEN Chonggui, “我信圣经的理由 Woxin shengjing de liyou” [The Reasons I Believe in the Bible], 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 No. 2, (1930), 64.

不仅无误,而且前后连贯,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圣经新旧约六十六卷,是统一的整个的,是始终一贯的,是前后相连的。”〔3〕这种统一性体现在圣经主题的统一、教导思想的统一以及内容前后衔接的完整性上。陈写到他自己正是因为经历了圣经话语的神圣性和感动力,所以才完全归信基督,同时他也批评自由派神学的圣经立场。他不仅确信圣经的权威,也对圣经饱含热爱,他曾回忆道:“这二十余年来,每日有一个最大的快乐,即是研究圣经和讲关于圣经的书,而且愈读愈爱。”〔4〕圣经的真实性,对于陈来说,正是体现在一种不变性。他认为圣经成书上千年而流传至今,虽经各种诋毁批判,但圣经从未改变,而这“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圣经是神的书,内容是神的话,是神感动人的,因为是神的书,人就不能毁灭”〔5〕。

不仅如此,陈崇桂相信,圣经是一本“活”的书,它能够赐人以生命。“圣经真是生命之道,圣经的话真是有生命的,是活的。”〔6〕所谓“活的”,就体现在圣经不是抽象的知识学问,而是引导人认识基督,跟随基督的途径。“基督教就是基督,圣经就是启示基督。读圣经,就是追求知道,而认识耶稣基督。”〔7〕圣经可以解答人生的各种难题疑问,“圣经如镜照人的面,那镜却是神的眼睛……圣经是宝剑,活神拿在手中剖开刺入人的心内。”〔8〕所以,陈非常重视解经的应用,圣经诠释绝对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为了教导信徒认识基督。只有真实的践行,才能够明白圣经。正如他写道,读经“最不可少的,还是一个立志遵行的心,因为基督的真理,是行才知,不行则不知,行多少才算知多少”〔9〕。对于陈来说,圣经作为上帝所启示出的“不变的真理”,应该并且也可以被应用在“万变”的人生境遇与时代处境之中。

这种应用首先体现在个人“修身”之上。虽然陈崇桂强调圣经的绝对权威,但他并非一个极端的圣经主义者,反之,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他对于儒家文化的欣赏与认同。陈崇桂特别写道:“我是自幼发蒙读书,将《马太福音》和《论语》《孟子》是同时读的,同样读的。”〔10〕他虽强调圣经具有最高的启示地位,其他民族的经典同样也能传递上帝所启示的真理。“神既然藉埃及王尼哥说话,为何不能藉中国的孔子老子,希腊国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国的释迦牟尼对我们说话呢?……凡与神的启示相合的,凡是真理皆是出于神。”〔11〕在释经中,他也常将圣经文本与《四书》中的君子境界相类比对照,使之更好地被国人理解。举例来说,陈在解释《列王记上》第三章中,他写道:“大学有这么一句话,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主耶稣亦说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

〔3〕 陈崇桂 CHEN Chonggui,“我信圣经的理由 Woxin shengjing de liyou”[The Reasons I Believe in the Bible],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No. 4(1931),54.

〔4〕 陈崇桂 CHEN Chonggui,“我信圣经的理由 Woxin shengjing de liyou”[The Reasons I Believe in the Bible],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No. 2,(1930),64.

〔5〕 同上 *Ibid.*,第 69 页。

〔6〕 陈崇桂 CHEN Chonggui,“我信圣经的理由 Woxin shengjing de liyou”[The Reasons I Believe in the Bible],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No. 4(1931),49.

〔7〕 陈崇桂 CHEN Chonggui,“研究圣经怎样开始 Yanjiu shengjing zenyang kaishi”[How to Start the Biblical Research],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No. 5/6,(1939),10.

〔8〕 陈崇桂 CHEN Chonggui,“我信圣经的理由 Woxin shengjing de liyou”[The Reasons I Believe in the Bible],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No. 4,(1931),58.

〔9〕 陈崇桂 CHEN Chonggui,“怎样读圣经 Zenyang du shengjing”[How to Read the Bible],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No. 6,(1932),109.

〔10〕 陈崇桂 CHEN Chonggui,“我信圣经的理由 Woxin shengjing de liyou”[The Reasons I Believe in the Bible],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No. 2,(1930),64.

〔11〕 陈崇桂 CHEN Chonggui,“历代志下第三十五章 Lidaizhixia sanshiwu zhang”[2 Chronicles 35],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No. 5,(1934),105.

你们了。”<sup>[12]</sup>在解释《申命记》三十二章摩西的诗时，他写道约瑟的事迹：“神搅动约瑟的巢窝，让他被弟兄所卖，被主母所诬，受羞辱，坐监狱，使他学而时习之，以致成为埃及国的救主。如同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曾益其所不能。’”<sup>[13]</sup>类似很多的例子，都可以体现出儒家哲学对于陈崇桂思想的影响。

进而，陈崇桂强调以圣经来看待社会和国家，实践“治国平天下”。他曾犀利地写道：“宗教若限于个人则成为酸味抑郁有病，若与爱国及实际生活则出到露天，健壮活泼有力。”<sup>[14]</sup>陈相信，一个人若有虔诚纯正的信仰，效法基督，便能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推而广之，便可以建造一个正直公义的社会，一个文明公义的国家，一个和平友爱的世界。因此，在陈的文章中，圣经对人的启发和教导，不仅限于个人，也是家庭生活的指南，改造社会和救国的“良方”，以及迎合时代的思想资源。因此，陈崇桂释经的旨趣，正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sup>[15]</sup>不谋而合，这种“内圣外王”的模式，也是陈社会理想中保持不变的框架。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来看陈崇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写作的释经文章，如何反映出其社会思想；或者说，他如何将圣经诠释与时代处境和社会议题相结合。

## 二、释经默想“治国”

1933年到1936年，陈崇桂将自己写作的圣经逐章注释文章发表在《布道杂志》的「灵修日新」版块。陈的《灵修日新》与贾玉铭《圣经要义》虽然都是全本圣经的逐章解经，但二者最不同的是，贾注重对圣经文本、结构、神学信息完整的诠释，而陈则是笼统概括某章大意或挑选一两节经文解释，更重在阐发它对现实生活的启发与应用，他将其称为一种“灵修”、“默想”的解经方式。

陈崇桂对于政局十分关注，他曾担任过冯玉祥的随军牧师，对有基督教背景的政要人物都寄予厚望，也对社会福音倡导者如贺川丰彦、艾迪等极为推崇。而这一时期，外有日本占领东三省，内有国共内战，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复杂。陈藉由灵修解经，阐发了很多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响应。在解释《以西结书》四十二章中“区分圣地与俗地”这句话时，陈便提出，社会福音精神应该与基要主义的信仰立场相结合。他先批判基要派说：“自以为虔诚精神的人，忽略人事，放弃人的本份，甚至出家出世。”<sup>[16]</sup>他也批判社会福音派的自由神学立场：“宣传社会福音，以社会服务为口号的人，不祷告，不礼拜，甚至不信有神。”<sup>[17]</sup>因此，基督徒应该既重视个人虔诚的信仰，又要在社会中积极服务。具体来说，他将圣经与现实相关联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点：

### （一）以色列与中国

圣经旧约包含着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律法以及先知的预言。很多自由派神学家认为旧约不过是

[12] 陈崇桂 CHEN Chonggui, “列王记上第三章 Liewangji shang disanzhang” [1 Kings 3], 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 No. 4 (1934), 68.

[13] 陈崇桂 CHEN Chonggui, “申命记三十二章 Shenmingji sanshier zhang” [Deuteronomy 32], 《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 No. 2, (1934), 80.

[14] 陈崇桂 CHEN Chonggui, 《圣经总论》*Shengjing zonglun* [Bible Survey], (香港 Hong Kong: 福音证主协会 Fuyin zhengzhu xiehui [Christian Witness Press], 1970), 103.

[15] 陈崇桂也非常“齐家”。在三十年代初期，《布道杂志》增加了“基督化家庭”版块，特别强调信徒应当带领家人一同信仰基督，建立“相爱和睦、敬虔圣洁”的基督化的家庭。正如他写道：“基督化家庭是我们中国教会今日最大的需要，许多基督徒的神和信仰，还是在礼拜堂，没有搬到家庭来。”陈崇桂 CHEN Chonggui, “把礼拜堂的基督教搬到家庭里来 Ba libaitang de jidujiao bandao jiatinglilai” [Move the Church Worship into the Family], 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 No. 2, (1934), 69.

[16] 陈崇桂 CHEN Chonggui, “以西结书四十二章 Yixijie shu sishier zhang” [Ezekiel 42], 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 No. 1, (1936), 71.

[17] 同上 *Ibid.*, 第 71 页.

以色列民族的宗教神话,没有太大价值。而基要派解经者则往往从“属灵意义”角度来看待以色列的历史,即认为它主要是“预表”基督和教会与信仰的灵性指导,正如贾玉铭写道:“当看以色列人之史事,实足表显神整个救恩的计划;亦适足映照我们的灵程。”<sup>[18]</sup>而陈崇桂则不然,他在解读旧约历史书和先知书的时候,往往将其与中国相关联。以色列人饱受外辱,内战不息,在陈眼中,这都与中国极为相似。以色列的苦难来自于背弃上帝之约所受的刑罚,所以陈也相信,中国的内忧外患同样是因为人民对上帝的拒绝和不断“犯罪”。

举例来说,《士师记》记载了以色列人定居迦南地之后,由于背弃上帝而导致社会混乱,并反复被外族奴役。陈崇桂认为,它所讲述的也是中国人的故事。《士师记》第九章讲到亚比米勒残杀同族而成为以色列人的王,而后被一个妇人杀害。陈崇桂首先重述了这个故事的梗概,他写道:

从前是藉外国的侵略压迫,刑罚他们,此次是本国内乱,弟兄骨肉相残杀。亚比米勒雇了些匪徒杀死他弟兄七十个人;就像我们中国,今日有人受了雇请,暗杀政治的敌人……(亚比米勒)想用武力统一全国,结果杀了许多同胞,毁灭了许多城邑。读圣经读到这里,觉得不是古书,乃是新闻了。这就是我们中华民国二十多年来常有的现象啊!武力统一,某省独立,打倒某某,某某又主张以武力统一,结果也是古今相同,杀死了许多同胞,毁灭了许多地方,制造了许多孤儿寡妇弄得农村破产,民不聊生。<sup>[19]</sup>

在文末陈写道:

国中有内乱,国人自相残杀,也是神的刑罚和报应。一百多年来神给我们中国听福音的机会,就全体说,我们拒绝真理,不肯悔改,归向真神;近年来更加顽梗悖逆,公然毁谤神,提倡打倒基督教,打倒道德……<sup>[20]</sup>

在此文中,陈崇桂首先用一种政治化的语句重述了亚比米勒的故事,比如“外国侵略”、“内乱”、“武力统一全国”、“打倒”、“骨肉相残”,这些词语表明了作者对这一故事的重构,使之不是旧事,而是现实。其后,陈崇桂藉由这个被重构的“政治故事”,批判眼下的内乱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进而,他解释中国内乱的原因与以色列一样,根本在于宗教上离弃上帝、拒绝福音,而遭到上帝的刑罚。陈还顺便批判了“非基督教运动”的“顽梗悖逆”。在《士师记》第十章,陈崇桂继续用类似的方法讲述以色列遭遇“帝国主义的侵害压迫”的故事。<sup>[21]</sup>以色列人与中国人所遭受的外辱,也是因为他们(或我们)在宗教上离弃上帝。

陈崇桂类似的解经还有很多,他以一种故事重述的方式,将以色列历史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试图透过以色列人在历史上的兴衰,来寻求中国今日面临种种苦难和混乱的根本原因。

## (二)上帝与世界

陈崇桂不仅关注中国社会,也对于世界局势非常关心,他同样努力在圣经中寻求上帝对于列国的

[18] 贾玉铭 JIA Yuming,《圣经要义》卷二 *Shengjing yaoyi* [Bible Survey], vol. 2, (上海 Shanghai: 中国基督教两会 Zhongguo jidujiao lianghui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2011), 1.

[19] 陈崇桂 CHEN Chonggui, “士师记第九章 Shishiji dijiuzhang” [Judges 9], 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 No. 2, (1934), 106.

[20] 同上 *Ibid.*, 第 107 页.

[21] 陈崇桂 CHEN Chonggui, “士师记第十章 Shishiji dishizhang” [Judges 10], 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 No. 2, (1934), 107.



旨意。我们以他对旧约《以西结书》的诠释为例。《以西结书》是先知以西结对以色列和当时的其他国家发出的预言。

一方面，陈崇桂将《以西结书》记载列国的罪恶都指向现代国家的纷争和弊病。《以西结书》二十七章先知预告推罗国将来的衰败，陈便将推罗联系当下，指出现代国家“在邻国制造灾难，即如赤化邻国人民，鼓起邻国内乱，藉以扩张本国的权力。”<sup>[22]</sup>这里所指的显然是苏联。《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继续记载了关于推罗的预言，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解经中，这一章是关于“撒旦的由来”的著名篇章。陈崇桂也提及了这一点，但是他对于神秘性的“灵界”解释并无太大兴趣，而是着力描述人类的罪恶。他指出，圣经中的列国“演出种种悲惨残忍的行为”，直到今天亦是如此。另一方面，他也反复要表明，无论列强如何有权有势，上帝仍旧是历史的主宰。他写道：“如今世界的强权，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苏俄日本等，不过是舞台上的主角。我们万不可忘记的，神并没有退位，不但世界各国，无论古今，都在他掌握之中。”<sup>[23]</sup>

### （三）革心与革命

陈崇桂从圣经阐发的社会思想，不仅仅是上文提到的社会批判，也包含对社会改造途径的思索。陈虽然主张以基督信仰和耶稣人格改造社会，但他认为若是只有外在的改造和服务，而没有个人的道德信仰为支撑，是舍本逐末的。因此，他提出，若要“革命”，必须先要“革心，即一个人要先重生得救，有了耶稣的人格，才能“治国平天下”。而这些思想便藉着他对于圣经人物故事的诠释表达出来。很多基要派释经者都非常擅长并热衷于讲述圣经人物的“故事”和对今日的教导，但他们往往集中于这些人物的灵性或道德品格，如王明道写得最多的文章是《从某某所得的教训》。而陈崇桂则将这些人物与社会改造和革命的思想相联系起来，使得他对圣经人物事迹的解读有一种不同的视野。

举例来说，《士师记》记载了参孙的故事，参孙是以色列人的士师、政治领袖，在讲到参孙的失败时，陈便将其与中国的社会改造问题联系在一起。他写道：

一个人若要救国，若要服务社会，必须用个人道德，个人信仰为根基。民国二十多年来，如同有人说：好话说完了，坏事做尽了。弄得外交丧地，内政民不聊生；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一般自命救国，为社会服务的人，个人的信仰消失，个人的道德破产，个人的行为像参孙，怎么能做出像摩西的事业来；现在有人发起新生活运动，也是看出这个关键来，但是要求神开我国领袖的眼睛，使知道唯有主耶稣赐人新生命，才能有新生活。<sup>[24]</sup>

在这里，陈藉由参孙的故事，尖锐地批判很多社会服务运动往往都只注重外表，而不注重个人信仰、品性和道德；并提出以信仰改造国家的思想。最后他也含蓄地对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表示了赞誉和期待。

再举一例，《路加福音》十九章讲述了财主撒该悔改的故事。通常人们都从个人认罪悔改的角度解读这个故事，但是，陈则从“耶稣愿意住在拉撒路家”引申到基督信仰所带来家庭的变革。他写道：“我们的家庭须要主耶稣这样变化，我们的社会须要主耶稣这样改良，我们的政府须要主耶稣这样革新……若是一个团体，一个社会有信心有胆量，实行耶稣的原则，那个社会和国家必定起革命，而且这

[22] 陈崇桂 CHEN Chonggui, “以西结书二十七章 Yixijie shu ershiqi zhang” [Ezekiel 27], 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 No. 8, (1935), 106.

[23] 陈崇桂 CHEN Chonggui, “以西结书二十八章 Yixijie shu ershiba zhang” [Ezekiel 28], 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 No. 8, (1935), 106.

[24] 陈崇桂 CHEN Chonggui, “士师记第十六章 Shishiji dishiliuzhang” [Judges 16], 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 No. 3, (1934), 66.

个革命是从革心做起。”<sup>[25]</sup>这也正是陈心中所向往的,从个人以信仰而“修身”,到效法基督而“齐家”,进而以耶稣人格“治国平天下”的模式。

陈崇桂的社会改造思想,以儒家政治伦理为框架,既吸取了基要派注重个人信仰纯正、灵性生命提升的重要性,又结合了社会福音派对社会改造、人格救国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将这种思想经由圣经而阐发出来。陈崇桂从民族的角度去看待圣经中所记载的以色列的历史,他们的兴衰荣辱、内忧外困,从而使得读者从这些原本陌生的异族历史中获得对民族命运的共鸣和思索。他所追问的,不再只是某个信徒,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可以从圣经中读到什么。陈崇桂的释经显然存在很多问题,如圣经中以色列历史是在其神学语境之下的宗教史,不应直接应用于中国处境。但是他的诠释拓展了基要派释经的视野,“修正基要主义的偏狭性,试图开出一条符合基要信仰的社会改革之路。”<sup>[26]</sup>

### 三、读经寻求“救国”

1937 年“七七事变”的爆发使得关心国家命运的陈崇桂非常震惊和愤怒。在当年《布道杂志》第十、十一期起,他写作了大量关于“国难”的文章,其“灵修日新”版块也被改为“国难中的灵修”。在随后的数年中,《布道杂志》始终积极关注抗战局势,这在基要派的刊物中是甚为罕见的。在这一时期,陈仍旧将圣经与中国的现实处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sup>[27]</sup>

#### (一)“代入式”读经法

陈崇桂反思了以往基督徒在读经中对社会和国家的忽略,“我们平日读圣经,多用个人的眼光,注重个人得救,个人灵修,这亦是要紧的,但是太少从国家的立场读圣经,追求明白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更没有用国际的眼光,研究圣经,查看神如何为‘万邦万国的主宰’。”<sup>[28]</sup>他在此特别提到应该从圣经中寻找儒家式“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认为,基督徒不可对民族危机和同胞苦难装聋作哑,而应该从圣经中寻找上帝对民族的旨意和安慰。他也指出,“基督教并不是一系统哲学,供几个上智的人悬想空论。基督教乃是对于在罪恶、愚昧、痛苦之中的人类,供献生命、能力、智慧、启示、安慰、勉励。”<sup>[29]</sup>

具体来说,陈崇桂提出了一种新的读经方式,以帮助人们在圣经中寻求国难中的安慰。这种方式事实上很简单,即词汇代入。举例来说,他将圣经中的一处经文直接改写为:“我为中国必不静默,为

[25] 陈崇桂 CHEN Chonggui,“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Lujia fuyin dishijiuzhang” [Luke 19], 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 No. 2, (1933), 83.

[26] 邢福增 YING Fuk-tsang,《中国基要主义者的实践与困境——陈崇桂的神学思想与时代》*Zhongguo jiyaozhuyizhe de shijian yu kunjing: Cheng Chonggui de sixiang yu shidai* [The Praxis and Predicament of a Chinese Fundamentalist: Chen Chong-gui (Marcus Cheng)'s Theological Thought and His Time] (香港 Hong Kong: 宣道出版社 Xuandao chubanshe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2001), 163.

[27] 陈崇桂对于国家与抗战的关注,这在基要派中是比较罕见的。有学者便误认为陈是自由派。在李韦 LI Wei,“抗战时期自由派基督徒知识分子对于耶稣形象的民族主义诠释 Kangzhanshiqi ziyoupai jidutu zhishifenzi duiyu yesu xingxiang de minzuzhuyi quan shi” [The Liberal Christian Intellectuals' Nation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Jesus Image in Anti-Japanese War], in《世界宗教研究》*Shijie zongjiao yanjiu*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No. 3, (2018), 148-156 一文中,多次引用陈崇桂在《布道杂志》中所写作的关于耶稣论述爱国的文章(页 149 注释 1、5, 页 150 注释 4),并称之为是「自由派基督徒知识分子」对耶稣爱国问题的论述,这是有误的,陈崇桂一直是明确反对自由派神学的,坚持基要主义立场的。在该论文的注释中,作者则将引文作者注为「编辑主任」,而引文中《布道杂志》的编辑主任正是陈崇桂本人。

[28] 陈崇桂 CHEN Chonggui,“国难中的信息 Guonan zhongde xinxi” [The Message in the National Sufferings], 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 No. 10/11, (1937), 4.

[29] 陈崇桂 CHEN Chonggui,“得胜世界 desheng shijie” [Overcome the World], 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 No. 3/4, (1937), 80.

南京必不息声，直到中国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中国的救恩如明灯发亮……”<sup>[30]</sup>这句话原文出自《以赛亚书》六十二章1节，在这里，陈将原文中的“以色列”改为“中国”、“耶路撒冷”改为“南京”，从而使读者将圣经与现实相联系，唤起民族情感，寻求上帝的安慰。他也将《以赛亚书》的另外一处上帝责备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经文，改为上帝对中国人和南京政府的责备，呼吁人民要在国难中转向上帝。

陈崇桂也使用“代入式”读经法来控诉日本侵略，将圣经文本中的“侵略者”读作“日本”。在《以赛亚书》中，亚述作为以色列的侵略者，终究也受到了上帝的审判。因此，陈将经文改写为：“中国我的百姓啊，日本虽然用棍击打你，你却不要怕，因为还有一点时候，发的忿怒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日本发作使他灭亡。”<sup>[31]</sup>他指出，这并非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坚信圣经中上帝既然曾经拯救以色列人，今天也同样要为中国人主持公义，上帝必会审判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陈崇桂同时也批评欧美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陈对于国联抱有极大的希望，相信这些“基督教国家”会主持公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所以，陈也将英美国家代入圣经中而写道：今天的英国就好像圣经中的推罗，推罗经济富庶却“因资材心里高傲”。但是，“英国对于外交的国策，也是以营业发财为主，不敢主持公道正义，他的势力能左右国际联盟，然而对于国际纷争却不敢说公道话，不肯以实力来维持正义。”<sup>[32]</sup>

陈崇桂创造了一种生动的、现实性的读经方法，从而流露出他对国家苦难的深切关怀，并积极地从圣经中汲取力量，寻找民族的安慰和力量。可以说，这种方法是上文提到的陈崇桂从中国社会角度理解“以色列”思想的延续，也是在特殊时代下更加直接的表达。陈也将其称为“读经”而非“解经”，后者是一种“教导”，而前者则是倡导一种普通信徒同样可以仿效的方式。

此外，陈崇桂也从对耶稣生平的再诠释中寻找国难中的安慰。1939年，陈在再次解释<sup>[33]</sup>《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耶稣受审的经文时饱含感情地写道：“我想今日的中国人更能同情主耶稣所受的毁谤，诬告，主耶稣精神上的痛苦……主耶稣更能同情中国人今日受异族侵略压迫，更能安慰我们精神上的痛苦。”<sup>[34]</sup>陈认为，中国人虽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耶稣也曾经经历被陷害、毁谤、虐待和背叛，因此耶稣完全能在情感与经历上认同中国人的痛苦，并与中国人一同受苦。这也与二战后莫尔特曼等神学家提出的耶稣与人一同受苦的神义论思想不谋而合。

## （二）两个时期的对比

我们以一个对比来看陈崇桂在抗战前后释经的差异，或者说社会环境的变化对陈解释同一段经文的影响。在《布道杂志》第六卷中（1933年），陈曾经做过《启示录》的逐章灵修注释。1939—1940年，陈再次在《布道杂志》中刊发了他新作的《启示录》诠释。两次释经中，陈都将《启示录》的很多内容联系到国家与社会的话题。不同之处在于，1933年国内局势整体相对平稳，乐观的社会福音思想仍旧盛行；而到了1939年，日本铁蹄肆虐中国，国破家亡、螭蟾沸羹。这种社会处境的变革，极大地影响了陈崇桂对于圣经文本的解释。

陈在1933年解释《启示录》第六、七章时呼吁个人得救，写道：“我们唯一要紧的事，就是现在解决

[30] 陈崇桂 CHEN Chongui, “用中国文字读圣经 Yong zhongguo wenzi dushengjing” [Reading the Bible in Chinese], 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 No. 10/11, (1937), 52.

[31] 陈崇桂 CHEN Chongui, “今日亚述国是谁 Jinri yashuguo shishei” [Which country is the modern Assyria], 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 No. 10/11, (1937), 55.

[32] 陈崇桂 CHEN Chongui, “推罗的错误 Tuiluo de cuowu” [The Mistakes of Tyre], 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 No. 10/11, (1937), 57.

[33] 陈崇桂 CHEN Chongui 曾经在《布道杂志》1933年第1期和第2期写过《路加福音》的注释。

[34] 陈崇桂 CHEN Chongui, “主耶稣爱国 Zhuyesu aiguo” [Jesus Loves the Country], 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 No. 3/4, (1939), 72.

这个个人得救的问题。”<sup>[35]</sup>而当陈 1939 年再次诠释《启示录》六章时,他恳切地写道:

他们相信神是圣洁真实的,他们求神给他们伸流血的冤。神本是施行报应的神。但是有他自己所定的时候日期,人有时候焦急地问神说,要等到几时? 圣洁真实的主啊,我们等候你给我们中国人伸流血的冤,减少敌人的罪恶,减少我们的痛苦。<sup>[36]</sup>

整体上,抗战时期陈崇桂对《启示录》的诠释,转向了对于“光明”、“正义”、“胜利”、“上帝掌权”、“伸冤”等主题的强调。正如他写道:“启示录书的主题,就是主耶稣必得最后的胜利……光明将要战胜黑暗,真理和正义将要得最后的胜利。”<sup>[37]</sup>由此,他将《启示录》中殉道者的苦难与上帝最终的伸冤,转移到中国民众在日本侵略下所承受的深重苦难,以及人们在黑暗的现实中对终将胜利的期待和寄托。

释经对于陈崇桂来说,既不是一项书斋中的学术工作,也不仅仅是教堂里的传道牧养,它也是为民族寻求出路,为国难寻求安慰的重要寄托和思想源泉。可以说,他是携带圣经投身于“万变”的时代洪流之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陈继续活跃于与政局紧密联系的“三自爱国运动”中。

#### 四、研经实践“爱国”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崇桂积极响应政府的宗教政策,参与到批判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与三自革新运动(后改为三自爱国运动)之中,并成为核心领袖之一。在这一时期,陈崇桂写作了很多带有时代和政治色彩的文章,以体现对新时代的回应。1955 年,陈在极力劝说王明道一同加入“三自”而被拒绝的背景下,出版了《实践的基督教》一书,以诠释新约圣经的《腓利门书》(以下简称《门》)。在民国时期,陈的释经皆是灵修类的短文,从未就圣经中某卷书进行逐字逐句详细的阐释。但在《实践的基督教》一书中,陈则用两万多字的篇幅,来“研究”只有六七十字的《门》。通过该书,我们可以看到陈崇桂以圣经诠释来响应新时代的需要,表达对“三自爱国”的拥护。值得一提的是,他将此书命名为“实践的”基督教,似乎着力说明基督教对于现实的参与性和服务性;事实上,他的这本书也是一本紧密联系实际,极具“实践”目的的研经书。

##### (一)“奴隶”的故事

陈崇桂在 1955 年教会正处在激烈震荡的处境下选择《门》,进行前所未有的细致研究,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门》是保罗为逃跑的奴隶阿尼西母向其主人腓利门写的一封信。因为阿尼西母已成为基督徒,故保罗希望腓利门能够重新接纳他。这卷书正是一个讲述“被压迫阶级”的故事,非常契合当时的时代精神。陈写道:“数百年来,最亏缺神的荣耀,给人类带来最大损害的,就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者。他们歪曲圣经,利用保罗劝勉仆人的话来剥削人、压迫人,偏不听从保罗的教训——要待阿尼西母‘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sup>[38]</sup>而当下的基督徒

[35] 陈崇桂 CHEN Chonggui,“启示录第七章 Qishilu diqizhang”[Revelation 7],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No. 5,(1933),81.

[36] 陈崇桂 CHEN Chonggui,“要等到几时呢 Yao dengdao jishi ne”How Long Until You Judge],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No. 1,(1940),69.

[37] 陈崇桂 CHEN Chonggui,“主耶稣得胜 Zhuyesu desheng”[The Triumph of the Lord Jesus],in《布道杂志》*Budaozazhi* [Evangelism],No. 11/12,(1939),50.

[38] 陈崇桂 CHEN Chonggui,《实践的基督教》*Shijian de jidujiao* [Practical Christianity](上海 Shanghai:广学会 Guangxuehu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55),5.



应该效法阿尼西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要效法耶稣的生活，努力工作，‘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一切行为若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那才是道德的行为。”<sup>[39]</sup>

## （二）“家庭化的教会”

陈崇桂从2节中“在你家的教会”，表达出对腓利门能够在家中建立教会、与家人一同服侍的大加赞誉。他写道：“使徒时代的教会是家庭化，家庭是教会化，我以为这是最合理的教会，也是最理想的家庭。腓利门的家庭作了一个模范家庭，真是基督化家庭”<sup>[40]</sup>。如前文所述，在陈崇桂的释经和神学中，始终有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模式。即使在解放后，限于社会环境不能再提及“基督化社会”，他的“基督化家庭”理想也没有改变。

然而，在三自运动引发教会界巨大分歧的时代背景下，陈崇桂又担心上面这种表达会造成“政治错误”，而与那些因拒绝加入三自教会而建立的“家庭教会”划清界限。他指出，“‘家的教会’，却完全不是现今有人进入地下工作，设立家的教会，有意的，或无意的为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陈进而批判“地下教会”是“危害人民的利益，被美帝国主义利用，作为侵略的工具……读者切不可歪曲圣经的教义随便滥用，因而中了美帝国主义的诡计”<sup>[41]</sup>。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这里还是上文中，陈反复提及一个重要的罪名：“歪曲圣经”。在浓厚的政治色彩下，陈还是反复以“歪曲圣经”作为重要罪名，也或许表明了他对于圣经不变的尊崇。

## （三）爱心与合一

陈崇桂认为，《门》的主题就是爱心与合一，而他反复地将保罗等人与现实中的一些人进行对比。陈提出保罗是有爱心的人，“保罗爱耶稣，因此也爱弟兄，爱众圣徒。因此也爱他的祖国，爱他同国的人”<sup>[42]</sup>。保罗所要教导的，也是要“向众圣徒有信心”，即信徒应该效法耶稣，彼此饶恕接纳，使得教会能够合一。而现实中的教会或个人则违背了这些教导。他们“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自以为纯正，破坏教会合一。“常有人说自己的信仰纯正，是合乎圣经；说别的宗派是异端，是离经叛道，是拜巴力的。”<sup>[43]</sup>“甚至相信在天下人间只有他一个人的信仰是纯正的，别人对圣经的解释都错了……以为全国的基督徒都背弃了神的约，都去拜巴力了，只剩下他一个人。”<sup>[44]</sup>

总之，这卷书教导读者，教会应该学习彼此相爱，彼此信任，彼此饶恕；并对社会有公开的好见证，体现出基督徒的思想被改变，人格被改造，有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反之，一切分裂教会、破坏合一的行为都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策略”<sup>[45]</sup>，不“合一”即不“爱国”。全书最后，陈崇桂写下祷告文：

（我们）看见原始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如何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彼此洗脚，互相体谅……今天教会中有个别拦阻福音的，反而自以为是保卫圣道；亵渎圣灵的人，反而自以为是最属灵的……求圣灵给我们新的亮光，叫我们知道，承认有彼此相爱的信心，才是纯正信仰……父啊，洁净你的圣殿，复兴你的教会，团结你的儿女们，以致我们身上将活神显给人看，以致人在教堂里得见我们得复活的主耶稣。这样才能荣耀神而为人民服务。<sup>[46]</sup>

一方面，从陈崇桂的言论中，我们看到在他此时的思想中，“相爱合一”的重要性是压倒一切的，是

[39] 同上 *Ibid.*，第5页。

[40] 同上 *Ibid.*，第25页。

[41] 同上 *Ibid.*，第26页。

[42] 同上 *Ibid.*，第35页。

[43] 同上 *Ibid.*，第37页。

[44] 同上 *Ibid.*，第41页。

[45] 同上 *Ibid.*，第45页。

[46] 同上 *Ibid.*，第50页。

纯正信仰的标志,而不再以是否符合圣经来判定“纯正”与否。另一方面,从他批判美帝“歪曲圣经”,批判不加入三自运动者“认为别人对圣经的解释都错了”、自以为“保卫圣道”,又反映出在陈崇桂心中,圣经仍旧分量甚重。在陈这里,美帝之错在歪曲圣经,异己者们之错在“自以为解经纯正”;并且他以解释《门》来发此批判,似乎也是为了说明,自己在这一时期的选择乃是符合圣经根据,而非违背其圣经信念。诠释这卷书,最直接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对教外,表明基督教并不违背社会主义思想,而是一个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宗教;对教内,巧妙地“从‘相爱合一’角度为‘三自运动’确立圣经根据,批评不加入‘三自’的教会,以实践爱国。”

## 五、结论

在民国时期,可以大体上说,基要派重视圣经而不关心社会,社会福音派关心社会而不看重圣经。然而,从对陈崇桂的研究,我们看到一个特例。在他身上,坚持圣经权威的“不变”,与对于民族国家命运的关切和对政治的投入,从而导致其圣经诠释之“变”,二者是共存的。应该肯定的是,陈崇桂的圣经诠释是有其价值的。如陈所说,圣经本身应是“活的”,释经不应该是抽象而冷漠的。读者在自身处境下解读圣经时所做出的反省与叹息,都应该是圣经诠释中的重要部分。特别对于中国人来说,如何能够让异域舶来的圣经跨越复杂的文化、语言、历史鸿沟,而对中国社会处境言说,在这一方面,陈崇桂做出了重要的尝试。陈试图将圣经的精神和原则,从信徒个人与教会的应用推广至社会和国家。我们无需多花笔墨讨论他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改造模式的不切实际之处,但是,他探索了一条基要主义圣经立场和社会福音思想的结合路线。“在心态上,陈突破了基要主义的限制,没有否定基督徒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与关怀,但是在具体的内容方面,事实上陈崇桂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社会重建方案。……其社会关怀的最大特色,主要是心态上的突破而不是内容上的创新。”<sup>[47]</sup>

再者,今日的读者很容易认为陈崇桂的“代入式”读经法是肤浅和简陋的。对此,陈自己已经做出了响应。陈崇桂在“七七事变”后提出要以中华民族的眼光来读圣经时,援引了卡尔·巴特的故事。巴特在荷兰一个神学院讲学时被其他学者批评,他反驳说这些学者们坐在书斋安枕无忧,“我是住在德国,处在忧患逼迫之中读圣经。”<sup>[48]</sup>陈进而声明:“本期《布道杂志》是中国基督徒在国难之中,从中国国家立场读圣经而写出来的。”<sup>[49]</sup>因此,我们不能无视他的特殊处境而对他以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态度求全责备。更重要的是,他提醒我们圣经诠释与释经者人生和社会处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者往往可以轻易判定诠释水平的优劣,却或许需要以一种对历史的同理心才能对诠释研究有更深刻的体会。陈在三自运动期间对于圣经的解读,同样是在深处剧烈的教会变革漩涡之中做出的,其中也包含了复杂的政治抉择。

圣经的诠释离不开对外境的关注、对现实的反思,否则就会沦为死板的训诂而失去生命力,或成为基要主义者的“孤芳自赏”。但是,通过研究陈崇桂在不同时代下解经中得出的社会方面的结论,也给予我们以反思。圣经诠释者过于关注社会和环境,过于渴望使用圣经去迎合现实的浪潮,是否总是有益;而在文本诠释中,过于强调读者的世界和回应是否会走向“作者已死”、文本可以任意解释的极端。那么,作为白纸黑字的文本,圣经的「不变」与人类现实生活的「万变」之间的张力如何平衡,圣经如何对现实处境言说,引导个人与社会响应挑战、直面抉择,今天仍旧是摆在每一个诠释者面前的难题。

[47] 邢福增 Ying Fuk-tsang,《中国基要主义者的实践与困境》*Zhongguo jiyaozhuyizhe de shijian yu kunjing*, (2001), 166.

[48] 陈崇桂 CHEN Chongui,《国难中的信息》*Guonan zhongde xinxi*, (1937), 4.

[49] 同上 *Ibid.*, 第 4 页.

**English Title:**

**Unchangeable and Changeable; Chen Chonggui's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d Chinese Society**

**ZHAO Pan**

Post-doctor, School of Philosophy, Hongshan District, Yujiahu Rd. Post-Doctoral Dormitory, Wuhan University, 430000 Wuhan City, Hubei Province, P. R. China. Tel. +8615071263218. Email: zhaopan813@gmail.com

**Abstract:** CHEN Chonggui (Marcus Cheng, 1884-1963), a famous Chinese Church leader in the Republican era of China, has written a lot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ve articles. As a Fundamentalist, Chen insisted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Bible and applied biblical teachings to not only the individual's life but also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In the 1930s, he wrote devotional interpretative articles on the whole Bible, expressing his social reform thought by associating Israelite history with China's social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being concerned with the fate of China, Chen proposed a new biblical reading approach that substituted "China" for "Israel" in the promises found in the Prophets. In the 1950s, Chen researched the book of Philemon to support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hen applied the unchangeable Scriptures to the changeabl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of China, attempting to meet social and political needs.

**Key Words:** Chen Chonggui;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Chinese Society; Republican era of China; Christianity